

一、启蒙精神的低吟

提 要

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，中国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剧烈分化。陈独秀、李大钊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并开始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，主张以革命的手段根本改造中国社会，对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宣传，加强革命思想的启蒙，并迅即在全国掀起了国民革命运动。胡适、周作人等则主张对中国社会采取渐进的、和平的方式改良中国社会，继续对封建主义进行批判，对民众进行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启蒙。这样，五四启蒙大潮过后，接踵而来的是一段时间的革命热潮和启蒙低潮。五四启蒙运动以后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鼓吹复古读经，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封建复古思潮。部分启蒙思想家对封建复古势力及封建的道德伦理进行批判和抨击，尤其对北洋政府推行的读经复古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，继续坚持五四精神，倡导启蒙思想，提倡男女平等。

打破烦闷之网的利器

茅 盾

有许多女子——我不如说是女青年，曾经热烈地要求过社交自由，曾经顽抗过父母代定的婚姻，曾经誓要谋生独立，不靠丈夫吃饭，但是后来忽然变了！

伊既得了社交的自由，忽又爽然若有所失，怨恨起来，烦闷起来了；伊既拼命退了父母代定的婚姻，忽又迷惘无措，觉得“自己择配”这副担子太重，宁愿分一半主权给别人，以便将来万一不如意时，尚可诿责他人；伊既已试过了谋生，便又绝口大叫资本家——或是社会太欺人，工作重而报酬少，觉得伊的劳力太贱卖了，觉得伊自有伊神圣的事业，这样的轻轻松松忙过一生，实在的不值得！

可怜的女子，伊们的理想的“天堂”是毁灭了，伊们那次感着幻灭的悲哀；伊们实在是被“社会改造家”骗了，伊们预约的“幸福券”，原来是一张废纸！于是我们就看见了许多觉悟后又反动出去的女子，就看见了许多烦闷厌世的女子。

烦闷厌世，思想反动的女青年呀，我并不敢鄙夷你们，也不敢憎恨你们，更不敢笑你们是无事自扰，我只可惜你们为什么如此看轻自己，不想自己原来是为克胜困难而生的；为什么竟相信“天堂”是一步可以走到，而且是别人安排好了请你们进去的？可爱的女青年呀！你们要自信自己的力量，你们要自己去创造一个天堂。自信和刚毅是打破烦闷之网的惟一的利刃。

生活之艺术

周作人

契诃夫（Tshekhob）书简集中有一节道（那时他在爱琿附近旅行）：

我请一个中国人到酒店里喝烧酒，他在未饮之前举杯向着我和酒店主人及伙计们，说道：“请。”这是中国的礼节。他并不像我们那样的一饮而尽，却是一口一口的啜，每啜一口，吃一点东西；随后给我几个中国铜钱，表示感谢之意。这是一种怪有礼的民族。……

一口一口的啜，这的确是中国仅存的饮酒的艺术：干杯者不能知酒味，泥醉者不能知微醺之味。中国人对于饮食还知道一点享用之术，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艺术却早已失传了。中国生活的方式现在只是两个极端，非禁欲即是纵欲，非连酒字都不准说即是浸身在酒槽里，二者互相反动，各益增长，而其结果则是同样的污糟。动物的生活本有自然的调节，中国在千年以前文化发达，一时颇有臻于灵肉一致之象，后来为禁欲思想所战胜，变成现在这样的生活，无自由、无节制，一切在礼教的面具底下实行迫压与放恣，实在所谓礼者早已消灭无存了。

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。动物那样的，自然地简易地生活，是其一法；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，微妙地美地生活，又是一法。二者之外别无道路，有之则是禽兽之下的乱调的生活了。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。蔼理斯对于这个问题很有精到的意见，他排斥宗教的禁欲主义，但以为禁欲亦是人性的一面，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，且不相反而实相成。人有禁欲的倾向，即所以防欢乐的过量，并即以增欢乐的程度。他在《圣芳济与其他》一篇论文中曾说道，“有人以此二者（即禁欲与耽溺）之一为其生活之惟一目的者，其人将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。有人先将其

一（耽溺）推至极端，再转而之他，其人才真能了解人生是什么，日后将被纪念为模范的高僧。但是始终尊重这二重理想者，那才是知生活的明智的大师。……一切生活是一个建设与破坏，一个取进与付出，一个永远的构成作用与分解作用的循环。要正当地生活，我们须得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。”他又说过，“生活之艺术，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，”更是简明的说出这个意思来了。

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，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。斯谛耳博士在《仪礼》序上说，“礼节并不单是一套仪式，空虚无用，如后世所沿袭者。这是用以养成自制与整饬的动作之习惯，惟有能领解万物感受一切之心的人才有这样安详的容止。”从前听说辜鸿铭先生批评英文《礼记》译名的不妥当，以为“礼”不是 Rite 而是 Art，当时觉得有点乖僻，其实却是对的，不过这是指本来的礼，后来的礼仪礼教都是堕落了的东西，不足当这个称呼了。中国的礼早已丧失，只有如上文所说，还略存于茶酒之间而已。去年有西人反对上海禁娼，以为妓院是中国文化所在的地方，这句话的确难免有点荒谬，但仔细想来也不无若干理由。我们不必拉扯唐代的官妓，希腊的“女友”（Hetaira）的韵事来作辩护，只想起某外人的警句，“中国挟妓如西洋的求婚，中国娶妻如西洋的宿娼”，或者不能不感到《爱之术》（Art Amatoria）真是只存在草野之间了。我们并不同某西人那样要保存妓院，只觉得在有些怪论里边，也常有真实存在罢了。

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，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，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，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之一了。这些话或者说的太大太高了，但据我想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，宋以来的道学家的禁欲主义总是无用的了，因为这只足以助成纵欲而不能收调节之功。其实这生活的艺术在有礼节重中庸的中国本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，如《中庸》的起头说，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，”照我的解说即是很明白的

这种主张。不过后代的人都只拿去讲章旨节旨，没有人实行罢了。我不是说半部《中庸》可以济世，但以表示中国可以了解这个思想。日本虽然也很受到宋学的影响，生活上却可以说是承受平安朝的系统，还有许多唐代的流风余韵，因此了解生活之艺术也更是容易。在许多风俗上日本的确保存这艺术的色彩，为我国中国人所不及，但由道学家看来，或者这正是他们的缺点也未可知罢。

原载《语丝》 1924 年第 1 期

精神的杀人罪

许寿裳

自从章士钊倒行逆施，要通令小学生读经以来，识者的议论就我所见到的，如虚生先生的《卑经》（《猛进》三十七），疑古玄同先生的《原经》（《语丝》五十四），鲁迅先生的《十四年的“读经”》（《猛进》三十九），已经说得很痛快了。虚生先生之文，断定经的地位最为妥当；玄同先生之文，说明经的真相最为精审；鲁迅先生之文，则将主张读经者之居心，解剖得昭然若揭了。时代已经到了二十世纪之 Quarter 了。Eilenkey 称二十世纪为儿童的世纪，她因为本国教科书之不足以引起儿童的感兴，猛力攻击，呼之曰“学校之精神杀人罪”。她如果见到我国至今还要以紊乱不堪，糊涂透顶的所谓经，来戕贼全国学生，真不晓得要作何等感想。精神的杀人罪，自然也有故意的，也有出于无心的，我但就民国十四年间，精神上之故意的杀人犯略略一说：

前清末造，稍有知识者皆出而运动废止读经，辛亥年学部教育会议场中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蓝白票之争非常激烈，卒以清廷因循，不肯毅然改革，于是人心大去，这也是革命成功之一

原因。民国开国，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子民先生首先废止读经，在当时看来，只是平常，有如家常便饭，了不足异；但由今观之，实在不能不说是刚断。当袁世凯一心想做皇帝，崇圣，读经，赏官，旌节种种把戏，层出不穷的时候，因为教育总长汤化龙不肯逢迎，袁世凯就命政事堂擅改学制课程，颁行全国，后来汤化龙便借端去职。云南起义，洪宪随即取消，袁世凯因之自毙，真所谓“千夫所指，无疾而死”。于是民国得以复兴了。其第一位教育总长是范源廉，以大名鼎鼎之人，居旋乾转坤之会，只劳一举手，便可以荡涤旧污，因为那时部中参事室已将袁世凯擅改不合之处，统统修改了。不料他别有用心，只于国民学校的一分画诺，其余则托词暂搁，永远不理。其取消国民学校之读经者，所以杜教育界之谴责，其留存高等小学及师范学校之读经者，所以买遗老们之欢心。心思确乎聪明，手段确乎巧妙，所以成为八面玲珑的美人，而十年间之精神的杀人罪，竟无人起来揭破。诚哉！“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！”真可谓深得读经之神髓了。

这回章士钊陈任中之流，不是口口声声说读经钟点，比向章并不增加，不过将高小读经钟点匀出一部分，分配于国民学校吗？欺人之谈，至于如此！试问读经既可分配到国民学校，何妨更进一步，兼课于蒙养园呢。况且“蒙以养正”，易经正不可不读。教育部之荒谬腐败，即此一端，已可想见。作恶之人，无论如何，总是要想出一个道理来文饰自己。这也是孔丘的精神。和孔丘同时的微生亩当面骂他谄佞，他回答说：“非敢为佞也，疾固也。”所以读经这件事，倘使范源廉早已取消，此番章士钊为要玩把戏之故，也还可以通令恢复，而且以“疾固”自文；何况典型尚在，那自然措词更顺，可以说什么“比向章并不增加”以自解了。

总之，就民国十四年间读经一事说来，精神杀人的主犯有三——袁世凯，范源廉，章士钊。至于陈任中之流，是更不足道。

狗抓地毯

周作人

美国人摩耳 (J. H. Moore) 给某学校讲伦理学，首五讲是说动物与人之“蛮性的遗留”(Survival of Savage) 的，经英国的唯理协会拿来单行出版，是一部很有趣味与实益的书。他将历来宗教家道德家聚讼不决的人间罪恶问题都归诸蛮性的遗留，以为只要知道狗抓地毯，便可了解一切。我家没有地毯，已故的老狗 Ess 是古稀年纪了，也没力气抓，但夏天寄住过的客犬 Bona 与 Petty 却真是每天咕哩咕哩地抓砖地，有些狗临睡还要打许多圈；这为什么缘故呢？据摩耳说，因为狗是狼变成的，在做狼的时候，不但没有地毯，连砖地都没得睡，终日奔走觅食，倦了随地卧倒，但是山林中都是杂草，非先把它搔爬践踏过不能睡上去；到了现在，有现成的地方可以高卧，用不着再操心了，但是老脾气还要发露出来，做那无聊的动作。在人间也有许多野蛮（或者还是禽兽）时代的习性留存着，本是已经无用或反而有害的东西了，惟有时仍要发动，于是成为罪恶，以及别的种种荒谬迷信的恶习。

这话的确是不错的。我看普通社会上对于事不干己的恋爱事件都抱有一种猛烈的憎恨，也正是蛮性的遗留之一证。这几天是冬季的创造期，正如小孩们所说门外的“狗也正在打仗”，我们家里的青儿大抵拖着尾巴回来，他的背上还负着好些的伤，都是先辈所给的惩创。人们同情于失恋者，或者可以说是出于扶弱的“义侠心”，至于憎恨得恋者的动机却没有这样正大堂皇，实在只是一种咬青儿的背脊的变相，实行禁欲的或放纵的生活的人特别要干涉“风化”，便是这个缘由了。

还有一层，野蛮人都有生殖崇拜的思想，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可笑，只是他们把性的现象看得太神奇了，便生出许多古怪的风俗。弗来则博士的《金枝》(J. G. Frazer; The Golden Bough——我所有只

是一卷的节本。据五六年前的《东方杂志》说，这乃是二千年前希腊的古书，现在已经散逸云！）上讲过“种植上之性的影响”很是详细。（在所著 *Psyche's Task* 中亦举例甚多。）野蛮人觉得植物的生育的手续与人类的相同，所以相信用了性行为的仪式可以促进稻麦果实的繁衍。这种实例很多，在爪哇还是如此，欧洲现在当然找不到同样的习惯了，但遗迹也还存在，如德国某地秋收的时候，割稻的男妇要同在地上打几个滚，即其一例。两性关系既有这样伟大的感应力，可以催迫动植的长养，一面也就能够妨害或阻止自然的进行，所以有些部落那时又特别厉行禁欲，以为否则将使诸果不实，百草不长。社会反对别人的恋爱事件，即是这种思想的重现。虽然我们看出其中含有动物性的嫉妒，但还以对于性的迷信为重要分子，他们非意识地相信两性关系有左右天行的神力，非常习的恋爱必将引起社会的灾祸，殃及全群（现代语谓之败坏风化），事关身命，所以才有那样猛烈的憎恨。我们查看社会对于常习的结婚的态度，更可以明了上文所说的非谬。普通人对于性的问题都怀着不洁的观念，持斋修道的人更避忌新婚生产等的地方，以免触秽：大家知道，宗教上的污秽其实是神圣的一面，多岛海的不可译的术语“太步”（*Tabu*）一语，即表示此中的消息。因其含有神圣的法力，足以损害不能承受的人物，这才把他隔离，无论他是帝王，法师，或成年的女子，以免危险，或称之曰污秽，污秽神圣实是一物，或可统称为危险的力。社会喜欢管闲事，而于两性关系为最严厉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我们从蛮性的遗留上着眼，可以看出一部分出于动物求偶的本能，一部分出于野蛮人对于性的危险力的迷信。这种老祖宗的遗产，我们各人分有一份，很不容易出脱，但是借了科学的力量，知道一实在情形，使理知可以随时自加警戒，当然有点好处。道德进步，并不靠迷信之加多而在于理性之清明。我们希望中国性道德的整饬，也就不希望训条的增加，只希望知识的解放与趣味的修养。科学之光与艺术之空气，几时才能侵入青年的心里，造成一种新的两性观念呢？

古书可读否的问题

周作人

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，只要读的人是“通”的。

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，倘若是强迫的令读。

读思想的书如听讼，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；读文艺的书如喝酒，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：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。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，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，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，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，还没有“通”（广义的，并不单指文字上的作法），不是书的不好。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，——列宁，马克思，斯妥布思，爱罗先珂……也要弄出毛病来的。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“通”，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，不但不会上它的当，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：古人云，“开卷有益”，良不我欺。

或以为古书是传统的结晶，一看就要入迷，正如某君反对淫书，说“一见《金瓶梅》三字就要手淫”一样，所以非深闭固拒不可。诚然，旧书或者会引起旧念，有如淫书之引起淫念，但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无知的书本，未免如蔼里斯所说“把自己客观化”了，因跌倒而打石头吧？恨古书之叫人守旧，与恨淫书之败坏风化与共产社会主义之扰乱治安，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。禁书，无论禁的是那一种的什么书，总是最愚劣的办法，是小孩子、疯人、野蛮人所想的办法。

然而把人教“通”的教育，此刻在中国有么？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。

据某君公表的通信里引《群强报》的一节新闻，说某地施行新学制，其法系废去论理心理博物英语等科目，改读四书五经。某地去此不过一天的路程，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报上都还不见记载，但“群强”是市民第一爱读的有信用的报，所说一定不会错

的。那么，大家奉宪谕读古书的时候将到来了。然而，在这时候，我主张，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。

原载 1925 年 4 月 5 日《京报副刊》

忽然想到（节选）

鲁迅

五

我生得太早一点，连康有为们“公车上书”的时候，已经颇有些年纪了。政变之后，有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，说：康有为是想篡位，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；有者，“富有天下”，为者，“贵为天子”也。非图谋不轨而何？我想：诚然。可恶得很！

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，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。屏息低头，毫不敢轻举妄动。两眼下视黄泉，看天就是傲慢，满脸装出死相，说笑就是放肆。我自然以为极应该的，但有时心里也发生一点反抗。心的反抗，那时还不算什么犯罪，似乎诛心之律，倒不及现在之严。

但这心的反抗，也还是大人们引坏的，因为他们自己就常常随便大说大笑，而单是禁止孩子。黔首们看见秦始皇那么阔气，捣乱的项羽道：“彼可取而代之！”没出息的刘邦却说：“大丈夫不当如是耶？”我是没出息的一流，因为羡慕他们的随意说笑，就很希望赶忙变成大人，——虽然此外也还有别种的原因。

大丈夫不当如是耶，在我，无非只想不再装死而已，欲望也并不甚奢。

现在，可喜我已经大了，这大概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罢，无论用了怎样古怪的“逻辑”。

我于是就抛了死相，放心说笑起来，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经人的钉子：说是使他们“失望”了。我自然是知道的，先前是老人们的世界，现在是少年们的世界了；但竟不料治世的人们虽异，而其禁止说笑也则同。那么，我的死相也还得装下去，装下去，“死而后已”，岂不痛哉！

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迟一点。何不早二十年，赶上那大人还准说笑的时候？真是“我生不辰”，正当可诅咒的时候，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。

约翰弥耳说：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。我们却天下太平，连冷嘲也没有。我想：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，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。大家渐渐死下去，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，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。

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，就先该敢说，敢笑，敢哭，敢怒，敢骂，敢打，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！

四月十四日

六

外国的考古学者们联翩而至了。

久矣夫，中国的学者们也早已口口声声的叫着：“保古！保古！保古！……”

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种，也不能保古的。

所以，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。

长城久成废物，弱水也似乎不过是理想上的东西。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，不肯变革，衰朽到毫无精力了，还要自相残杀。于是外面的生力军很容易地进来了，真是“匪今斯今，振古如兹”。至于他们的历史，那自然都没我们的那么古。

可是我们的古也就难保，因为土地先已危险而不安全。土地

给了别人，则“国宝”虽多，我觉得实在也无处陈列。

但保古家还在痛骂革新，力保旧物地干：用玻璃板印些宋版书，每部定价几十几百元；“涅槃！涅槃！涅槃！”佛自汉时已入中国，其古色古香为何如哉！买集些旧书和金石，是劬古爱国之士，略作考证，赶印目录，就升为学者或高人。而外国人所得的古董，却每从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风一同流出。即不然，归安陆氏的丽宋，潍县陈氏的十钟，其子孙尚能世守否？

现在，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翩联而至了。

他们活有余力，则以考古，但考古尚可，帮同保古就更可怕了。有些外人，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，这虽然可恶，却还不奇，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。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，并且要率领了少年，赤子，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，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。

中国废止读经了，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，教学生读“四书”么？民国废去跪拜了，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，要学生磕头拜寿么？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，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？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，则倒是崇拜道学，保存国粹的！

但是，无论如何，不革新，是生存也为难的，而况保古。现状就是铁证，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。

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，是：一要生存，二要温饱，三要发展。苟有阻碍这前途者，无论是古是今，是人是鬼，是《三坟》《五典》，百宋千元，天球河图，金人玉佛，祖传丸散，秘制膏丹，全都踏倒他。

保古家大概总读过古书，“林回弃千金之璧，负赤子而趋”，该不能说是禽兽行为罢。那么，弃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？

四月十八日

爱 国

许寿裳

爱国心不是无用的东西。依现时的实生活看来，组织国家还是一件最要紧不过的事，托尔斯泰所热心提倡了的非爱国论，正同万国平和论一样，还不能不说是尚早。但是爱国而出于偏颇，如以尚武为主义，以侵略为目的者，还是应在排斥之列，我们希望他早日灭亡；爱国而出于悖戾，如以自己的劣根性为特长，自己的坏癖气为美德，明明是卑怯，偏要以什么什么自文，明明是惰废，偏要以什么什么自诩，这样腐败的爱国，他的灭亡是自然的定律，更不劳人们来希望的了。本来爱国与革新是相需而不可离的事。正惟爱国，所以要革新；正惟革新，所以国才能够不敝，而中国一般之所谓爱国者不然。他们以为中国一切已经够好了，既然爱国，就不该革新，如果革新，就不是爱国，把爱国与革新视为绝对相反的事；于是结果也相反，愈爱国，愈腐败，弄到国既不国，人也不人的地步才完！

一国的青年只要发育是正常，就没有不抱革新的理想的。这不必远征博引，自己内省固可以了然，目前事实也很显著，例如孙中山先生的二十岁便决定倾覆清廷，创建民国之志，章太炎先生的十三四岁读蒋氏《东华录》，便发愤于异种乱华，光复独立，都是青年应有的心理，并不是两位先生的特异之处。两位先生之所以伟大，所以成功，乃在锲而不舍；若在常人，则因成年以后，逆料自己理想之难以实行，不免中道而废。荷尔（Stanley Hall）所谓“成人是一种堕落和退化”，便指这个意思。理想愈高，追求他自然也愈难，幸有次代的青年继续努力，终不患没有实现的一日，即使不能及身亲见，总而言之，青年是没有不抱革新的理想的，除非是变态。

然而中国青年变态者何其多也！其对于国内现状，视若当

然，并不发生何种疑问，即无所谓青年时代的烦闷；体力虚弱；意气消沉；道学伪善之风不可向迕；昏愤糊涂之论层出不穷。从前我只知道发育正常者，白首犹有童心，现在则所见者青年而早成老悖，这是最可寒心的。——说到读书吗？最爱读的第一部是《红楼梦》，这使我起了一种感想，仿佛与征求大家庭中优游岁月的老太太们的读书趣味，得了同一的结果。近时文坛的创作还多是模仿红学，所以很受青年们的欢迎。爱读书之中，外国书本或译本甚属寥寥，足见和外来思潮的格格不相入；宜乎一听人说青年要少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的话，便骂他卖国贼了。——养生吗？据医院的统计，69%以上的花柳病，青年学生占了极大的多数，而汉族女子体格的衰萎，望之竟如一张纸板，简直在人种学上添了独一无二的标本。又偏有留学外国研究优生学的青年，说卫生与优生是对待名词，说医学卫生学不发达，死亡者愈多愈早，则其弱质遗传的机会愈少，而有益于人种改良。这是何等的奇谈！——两性问题吗？又是说妙天下：说恋爱选择是盲目的，是反优生的；说父母代办婚姻，于两方的家系和身心得以审慎考察，是有优生意义的；说送子观音，联姻月老一类半滑稽的信仰也不无良善的影响的。这些更从何处说起？——道德问题吗？自然是天下第一，尽善尽美。据说连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这一句古训也是有大道理的：因为不事智识生活，乃得注其全力于家庭之巩固，俾子女得一发育之地盘，其于种族全体亦不无功德可言。奖励守节，据说实效也在此。一面又有颠倒事实，在演说席上，大言不惭地去骗外国的妇女，说中国从来女子的待遇是平等的，从来不曾有看轻女子的思想的莫过于婚礼中的亲迎，你们听了，想必也很想要到敝国同去做儒门的女子了。

以上所举的不过几端，但其对于人生的根本关系，取何种态度，却已经十分明了了。既然，对于身体修养，不主元气活泼而主荒淫戕贼，对于学艺趣味，不主独创新机而主虚伪涂饰，对于性爱，不主自由而安于因袭，对于道德，一味伪善而自欺欺人

所以对于国家，不主革新而流于腐败，也正是毫不足怪；因为对于人生的根本关系，一言以蔽之，都是悖戾的，毁坏的，而非健全的，创造的缘故。

这个病根全在卑怯。惟其卑怯，所以议论必至于模棱，思想必至于淆乱，品性必至于汙邪，道德必至于堕落，这决非一朝一夕之故，自然受“古国精神文明”之赐，也就是道儒两家老聃孔丘之功。老聃说，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可见其贪心而没有去做的勇气，不过效无赖子的口吻，聊以自慰而已。其他“无为权首，将受其咎。人皆取先，己独取后”云云，无一不表示他的胆怯。孔丘自称，“无可无不可”，即深得他的老师的秘诀，所谓“中庸”，所谓“知命”，实在都是卑怯的遁辞罢了。不过“时细则绌，时伸则伸”，行义可以从时而变，比起他的老师来，手段又高明得多了。这两家的思想确是“精神文明”的中心，在跼天蹐地的人世中，活用起来，未尝不可以苟延残喘，而态度是消极的，暮气沉沉，使得青年心理为之变态，则又是必至之弊，无可幸免的。

我们现在要爱国，必先学 Nietzsche, Ibsen 的个人主义来做个基础。服膺 Nietzsche 的“没有什么是真的，一切只是允许”（Nichts ist wahr alles ist erlaubt）说而后能勇猛无畏，服膺 Ibsen 的“有或全无”（All or Nothing）说而后能打破中庸，一意猛进。

原载《莽原》 1925 年第 3 期，署名：上遂

论 睁 了 眼 看

鲁 迅

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，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：《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》（《猛进》十九期）。诚然，必须敢

于正视，这才可望敢想，敢说，敢作，敢当。倘使并正视而不敢，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。然而，不幸这一种勇气，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。

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另一方面——

中国的文人，对于人生，——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，向来就少没有正视的勇气。我们的圣贤，本来早已教人“非礼勿视”的了；而这“礼”又非常之严，不但“正视”，连“平视”“斜视”也不许。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，在体质，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，低眉顺眼，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，驯良的百姓，——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，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，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。

再回到“正视”问题去：先既不敢，后便不能，再后，就自然不视，不见了。一辆汽车坏了，停在马路上，一群人围着呆看，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。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，虽不正视，却要身受的。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，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，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，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，他们总即刻连说“并无其事”，同时便闭上了眼睛。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，当前的苦痛不过是“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”于是无问题，无缺陷，无不平，也就无解决，无改革，无反抗。因为凡事总要“团圆”，正无须我们焦躁；放心喝茶，睡觉大吉。再说费话，就有“不合时宜”之咎，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。呸！

我并未实验过，但有时候想：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，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，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，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，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。中国的文人也一样，万事闭眼睛，聊以自欺，而且欺人，那方法是：瞒和骗。

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，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，他于